

东亚经纬

2023年第2期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东亚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构建（刘华）.....	1
中国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抉择（任丽）.....	6
试论日韩关系新动向（许寿童）.....	10
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简析（尹虎）.....	14
韩国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程璐璐）.....	19
◆学术动态.....	24
◆征稿启事.....	27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23年6月30日

东亚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构建

东亚海洋法研究会 刘华

根据合作机制构建理论，首先需要中日韩三国建立共同的理念和统一的目标，共同的理念有助于三国凝聚共识，但从目标上来看，中日韩三国各有其追求的目标，各自面临不同的海洋环境问题，也具有不同的治理能力。只有确定统一的目标引领，才能保证治理的效果；其次需要的是合作机制本身的自治能力，包括信息共享机制、资金保障机制、预警、执法和行动机制、监督检查机制、评估评价赔偿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能力。最终三国在共同目标下，达成在海洋环境领域一体化的一套规则体系。

一、确立共同的理念和统一的目标

区域性海洋环境治理概念的提出，为中日韩在黄海、东海构建合作机制提供了传统区域性海洋治理的理念借鉴，而且中日韩三国由于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争端，三国在东海、黄海海洋利益上存在很大利益交织。同时在海洋环境方面，敏感度较低，对于减轻三国在争端资源的博弈性方面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共同、共享、共商、共建”理念已经成为全球治理观的价值内核，其所追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价值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目标一致，其所谋求的全球安全、发展共赢、共享、和平等目标和国际法的价值相同。而积极推动中日韩区域性海洋环境治理是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维度。中日韩在黄海、东海构建环境合作机制，基本上也需要三国秉承共同、共享、共商、共建的理念。

(二) 以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为切入点

从目前中日韩三国海洋环境机制构建面临的困境来看，最为迫切的就是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22日，中国政府部门针对此事发声反对达30余次，作者参考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及相关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进行统计。学者以及媒体等各界也通过论文、会议、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关注此问题。韩国在该事件宣布后立即召开多次会议，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日本单方面宣布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之前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对风险后果的应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组织了来自11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组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态支持工作组的调查活动。韩国学者、政府、报刊以及民间组织也不断发声和发表刊文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日本福岛民众也不断集会来反对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目前该事件已经成为三国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在该问题上，三国面临着很多建立合作机制必须解决的信息公开、共享的问题、影响评估评价的问题以及污染损害赔偿解决的问题等，几乎囊括了目前三国建立合作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从该事件的解决入手，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机制构建的努力方向

从机制构建的内容上来说，应当包括信息公开共享、建立统一的规则、国家的法律责任、损害赔偿影响评估、争端解决、预防性措施、大数据与法律分析、应急管理与风险防控、证据收集、交流与合作等各个方面。

(一) 信息公开透明化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从福岛核污染水事件来看，目前最为迫切的事情就是信息的透明、公开和共享。及时获取环境损害情况的信息，能够使相关国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启动应对方案，减少损害的发生。鉴于海水的流动性，中日韩三国在该区域的海洋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一国的环境问题都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信息及时透明地公开、共享非常有必要，也是贯彻风险预防性原则的重要方式。

在此之前，《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建立过数据和信息网络区域活动中心作为信息交换平台。但实施效果却非常不佳。因此，在数据共享内容上应该明确相关的事项，由专门人员负责对相关的政策活动以及情报资料和突发事件进行公开。以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件为例，日本在未与周边国家进行商议的前提下，单方面宣布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而如果在该机制要求下，日本应当迅速、及时、透明地公开福岛核电站以及水质的具体情况及相关数据，并与中韩两个国家进行磋商。此外也包括相关研究方案以及资料等方面的合作交换共享。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

件，目前国际上也缺乏相关案例，限于目前科学技术的限制，福岛核污染水的安全性还有待考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进行科研和应对措施方面的交流合作，可以更好地推动问题的解决。

（二）以民间环保组织推动，降低敏感性、寻求灵活资金保障

世界范围内比较成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案例中，都涌现出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身影。东北亚地区目前海洋环境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作为主要域内推动力量的中日韩三方虽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对环境的诉求不尽相同，加之政府推动环境合作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难免需要考虑复杂的政治环境。而通过民间海洋环境组织治理和解决环境问题，可以更大限度地减少政治环境带来的敏感问题，也可减少在海洋环境保护责任承担上的分歧。同时民间非政府组织还可激发民间活力，增强民众间信任，推动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从而为机制的资金来源提供更加灵活的保障。

2020年6月末，韩国海警厅发表了“民间防治资源管理及合理费用计算方案”的研究结果，宣布将推动对平时民间防治资源的管理，推进支付适当防治费用政策的制度化。如果该政策能够得以实现，将最大限度地提高韩国的国家海洋环境防治能力，激发民间防治市场的活力。这也为中日韩环境合作机制带来一定的市场活力。

推动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以民间交流推动政府层面的合作可以更为准确地找到利益共同点，增强合作深度。另外民间组织资金保障的方式方面比较灵活，可以通过多种灵活途径保障资金的供应，只需要政府能够在一定情况下支持，会起到一定程度的效果。比如环境保护科研项目的启动，可以联合相关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共同实施。

（三）通过环境预警合作制度构建，增强指导作用

预警原则作为可持续发展方式中的一种，对海洋环境合作具有指导性作用。三国所在的东北亚地区政治环境复杂，建立中日韩海洋环境预警合作制度不失为一种折中方式。

1992年《里约宣言》提出：“各国根据自己的能力应广泛应用预防办法，保护环境。凡有严重威胁或不可逆转的损害，不得使用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防止环境退化的措施。”1992年《里约宣言》，原则。同时强调了预警机制的重要作用，即“对于海洋环境的污染，最适当且为各国普遍接受的预警措施是授证许可证、风险评估、针对危险物质采取负面表列方法，以及利用最佳可得技术的义务”。

从黄海与东海海域现状来看，半闭海的性质使其必然面对更为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域内污染治理合作程度仍然较低，不仅制约了各国解决共同面对的海洋环境问题的能力，也使得各国在完善内部环境法律时失去了外部的激励。虽然黄海、东海海域尚未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来证明海洋环境在今后可能发生的退化现象，但如果沿岸国家继续在该海域内争夺海洋资源和海洋权

益，势必会导致出现更为严重的环境威胁和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沿岸国根据预警原则，采取普遍接受的预警措施，是比较有效且有益的域内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法，具体到黄海、东海海域，便需要中日韩三国根据预警原则的内涵，首先建立预警合作制度，且该制度应该覆盖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等相关方面。

鉴于三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结合黄海、东海半闭海区域特点，笔者认为，中日韩可以现实分阶段建立预警合作制度：第一阶段，目前三国环境保护合作主要依靠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虽然该机制还是功能性的，合作内容与分工等尚不够具体，但预警合作机制的建立可以在该会议基础上进行，即适当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水平，细化合作流程与分工，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推进效率。第二阶段，建立三方共同参与的协调机构。具体来说，该机构应该包含信息共享制度、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定海洋区域保护区、监测制度、许可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以及争端解决制度等，分别对三国在海洋环境保护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协调与解决。第三阶段，可在三方合作更加紧密的条件下，建立三国共同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委员会，以前期各项实践为基础，尝试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促成区域内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

（四）通过构建中日韩贸易与环境利益关联机制增强互信

在黄海、东海半闭海区域内，目前受到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各国的环境治理理念差异等影响，很难出现一个能够统筹区域内国家关系的超级国家机构，域内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韩国，都难以成为具有号召力的核心国家，因此无法复制比较成熟的地中海模式等区域合作模式。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的主导力量，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处理海洋环境合作问题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刺激经济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经济发展促进环境合作，构建贸易与环境利益关联机制，进而推动整个区域内的海洋环境保护。

区域内贸易的层次和紧密程度是环境合作顺利推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日韩间可借助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 FTA)的良好契机，尝试建立贸易—环境关联协议，即借鉴北美环境协定的成果，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通过贸易—环境协议的方式连接起来，同时实现国家经贸水平的提高和区域环境治理的改善。关联协议可以通过降低关税的方式，促使三国的环境产业形成规模经济，以此在改善黄海和东海海域的环境状况的同时缩短三国之间海域治理技术的差距。随着贸易频率的增加，中日韩三国关系将更加紧密，相互之间了解和互信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可以为贸易—环境关联协议的升级创造基础，也可以推动黄海、东海区域内各国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实施。

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首先，改善中日韩国家间利益诉求分散的现状。鉴于三国相互依赖程度比较低，可以从中日韩自贸区在贸易政策上改善来提高三国总体消费能力，扩大市场规模。其次，随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三国可进一步签订关联协议，协

商降低关税，构建更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区，尝试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缩短中日韩三国之间在海洋环境治理技术方面的差距。

三、构建具有约束力的三国合作法律框架

区域性海洋环境治理体系法律机制的建设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重要变量：区域内国家的国内立法与政策、区域相关协定、国际法等。对于中日韩环境保护机制的法律构建，首先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总体的法律规范，而针对核污染水、微塑料、海洋垃圾等中日韩三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可以单独确立法律规范，包括环境损害的标准以及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的界定等。其次，因中日韩对渔业等生物多样性问题共识明显且有相关渔业协定为基础，可将水产品、微生物等作为本区域内的一项首要关注目标。

再次，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等对域外可能产生影响的大型环境事件，需要与目前的国际法以及相关国际组织进行协调，确保法律系统的一致性。最后，三国可以建立统一的海洋放射性监测体系，加强各国进口水产品的安全管理，扩大相关的监测点以及加强对水产品的质量检测。建立及升级可预测污染物质流动及污染物质扩散评估模型，确保在发生环境损害后，迅速获取污染物质的排放浓度、持续时间等数据。

此外，对于可能产生的环境损害的争端及赔偿，可以在现有的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基础上，设置职能机构，配置专门的中日韩区域合作办公室作为协调和执行机构。因福岛核污染水问题以及其他海洋环境问题涉及到诸多法律、环境等专业知识，建议选派权威专家组成专门的法律与技术委员会提供支持，并由各国协商一致遵照执行。

中国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抉择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任 丽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既包括城市和乡村，又包括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老少边地区在内的全域现代化。这里所讲的全体人民是由城乡居民或者各区域居民构成的整体，从空间角度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城乡居民和各区域居民都要富裕，逐步实现城乡区域共同富裕，也即全域共富。全域共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也是其空间体现。中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在新发展阶段，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作为主基调，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统筹和央地分工，以区域协调促进全域共富，推动区域发展战略由注重经济协调向促进全域共富转型。

一、将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作为主基调

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当今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两大核心主题。最初学术界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路径分别开展研究，但事实上，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是相互促进并紧密联系在一起，需要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本身就是国家层面或上一级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内在特征，也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对所有地区的普遍要求，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必须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各个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定了方向。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各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有鉴于此，有必要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在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建立联动和衔接机制，推动形成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之路，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区域发展的主基调。其中心任务是构建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更高水平是指我们需要的区域协调发展并非是一种低水平的区域均衡，而是一种高水平的区域全面协调；更有效率是指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在实现高效率的过程中全方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更加公平是指赋予各地区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益，更加强调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发展成果共享，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和居民收入均衡化；更可持续是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各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首先要依托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核心区域，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推动形成能够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体系，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其次，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多途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体系、制度体系、机制体系和政策体系。此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需要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在更高水平上高质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二、加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统筹力度

城市与乡村是两类不同的地域空间，从广义上看，城乡协调发展也可以看成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在国家层面相继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都承担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是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但由于这些战略在国家战略体系中承担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不同，其协调难度也在日益加大，在实施中还有可能会存在一定冲突和不协调，因而需要在战略顶层做出相应安排，切实加强战略衔接和统筹的力度，强化各种战略的区域协调功能，使之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战略。从狭义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指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以及国家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战略安排，它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体系中起着核心和基础作用。从广义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指国家层面带有协调功能的各种区域战略的总称[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和陆海统筹等方面的内容都纳入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也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重大战略是针对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区域制定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并承担各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功能。除了前述的五大战略，也有学者把海南自贸港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列为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明确了各类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导向，通过实施差别化的空间管控、发展路径和区域政策，规范和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有利于各主体功能区域实现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同样具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功

能。

例如，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城镇化规模格局和空间格局的优化无疑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之策，各级政府对脱贫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力度的加大，也有助于推动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因此，有必要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导向，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骨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加强各个战略之间的统筹衔接，增强各区域战略的协同性，充分发挥其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的责任，需要在建立健全有效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分工，构建多层次的区域协调发展调控体系。近年来，中国政府间财权在上移，而事权则在下沉，由此出现了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现象。

尤其是，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方面，大都采取主要由省级及以下政府承担的模式，由此造成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为此，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性作用，采取组合式的政策手段，促进国家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重点是促进四大区域和省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并对特殊类型区域给予相应支持。各省级政府同样肩负着促进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区域协调发展，如江苏省苏南与苏北地区、广东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协调发展，主要是省级政府的责任。对于地级市和县级政府而言，同样需要高度关注区域内部发展差距，统筹推进中心城区与县域协调发展，支持欠发达乡镇和经济薄弱村加快发展，有效破解村庄分化。

三、寻求面向全域共富的战略新举措

长期以来，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学术界存在着究竟是追求“个人富裕”还是“地区繁荣”的争论。这一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以后，学术界对此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持续讨论。从空间角度看，这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干预思路，“个人富裕”强调个人的福利而不考虑其地区分布，而“地区繁荣”强调需要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前者被称之为空间中性的，后者则被称为空间干预。从要素迁移角度看，这两种思路也就是迁移人口还是转移资本的问题，或者说是根据工作岗位移动人，还是根据人设定工作岗位。

如果追求“个人富裕”，则需要转移人口，实现人的富裕；如果追求“地区繁荣”，则需要转入资本和产业，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总人口达 1000 万人，使那些处于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从大的地域范围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任由大范围的区域贫穷或者衰落下去，大多实施区域政策支

持落后地区发展和萧条地区振兴。因此，过分强调“个人富裕”而否定“地区繁荣”，实际上是对区域政策的否定。

人类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空间。如前所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是城乡区域共同富裕或者全域共富，而不仅仅是一少部分地区的富裕，更不是少数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富裕。在共同富裕的视域下，要突破“个人富裕”还是“地区繁荣”的传统线性思维定势，尊重人的意愿及其就业、居住选择权，兼顾区域协调发展的多维目标，寻求面向全域共富的战略新举措。首先，要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据，对于那些“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生态条件恶劣地区，实行生态移民搬迁致富是必要的；对于那些人口过度膨胀并超越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大都市区，同样需要引导其人口疏散。其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切实保障人口自由迁徙和居民居住权，按常住人口配置和优化公共资源，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第三，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依然十分重要，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区域经济的内生活力，尤其要将加快县域经济和欠发达地区发展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第四，要发挥各地区优势，建立各具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各地区居民就近就地提供更加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岗位，实现各地区居民收入均衡化和生活质量等值化。

从更大的空间范围看，实现全域共富，还需要考虑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一般认为，市场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机制，应该发挥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空间效率的取得也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作用来实现，政府的区域援助政策将更多考虑公平目标，实行“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魏后凯等，2011）。在整个国家层面，要采取鼓励产业西进、人口东流的策略，把转移产业与转移人口有机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促进产业分布、就业岗位与人口分布相匹配。在具体区域层面，要遵循城乡发展规律，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依托，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更高质量的全域共富型城镇化格局。

试论日韩关系新动向

海南三亚学院政治系 许寿童

2023年3月16日，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并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12年来两国间首次正式首脑会晤。报道称，此次首脑会谈确认了日韩、美日韩合作应对朝鲜的重要性，同时还就重启中断11年以上的两国首脑定期互访“穿梭外交”达成共识。会谈结束后，双方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岸田文雄表示，面对朝鲜的核导弹威胁，日本和韩国同意恢复双边安全会谈，确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表示将“共同努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尹锡悦则表示，同意与日本恢复自2019年起中断的双边军事情报共享协议，韩国总统办公室称，此次访问和会晤，是日韩双边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无论是从既往历史，还是当前现实来看，日韩两国此次握手成交的不过是一份“期权”，未来面临诸多变数；而尹锡悦顶住国内批评压力完成的此次韩日“里程碑”式握手，也难免会成为“虚活儿”。

一、慷慨的外交

历史上，日本曾多次侵略朝鲜半岛，并于1919年至1945年期间将之完全吞并和殖民化，“二战”期间所遗留下的强迫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尤其是日本政府和责任企业对上述历史罪责的搪塞、推诿、拒绝担当，长期困扰着日韩关系。此外，日韩间还存在独岛（竹岛）等主权争端，以及日本单方面对实施韩光刻胶等半导体及显示面板材料出口限制，韩国则将之投诉到世贸组织，导致双边经贸关系也龃龉不断。尽管在共同军事保护者——美国的左右下，日韩于1965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历史和现实矛盾纠葛，令这两个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间关系始终微妙，甚至是摩擦不断。

2022年5月10日，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随即不断释放出对日“亲善”信号。日前，就2018年韩国法院要求新日铁和三菱重工两家日本公司向“二战”期间所强征韩国劳工支付赔偿金问题，尹锡悦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建议由韩国国家支持的基金代替日本公司支付。

在访问日本之前，尹锡悦更公开表示，日本是与韩国“拥有共同普世价值的伙伴”，称美日韩三边合作“较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此次双方“握手”，日方所得更多。

日本政府所希望的，就是仅做出有限的、尽量一次性不重复的经济妥协，一劳永逸地了结日韩间的历史纠葛，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岸田内阁从尹锡悦那里所获得的，甚至

比以往任何一届日本内阁所期望的更多：尹锡悦自上任至到访东京，从无一言涉及殖民历史及主权争端问题，甚至日本原本让步稍多的企业赔偿领域，尹锡悦都“慷慨了一把”，而日本内阁仅仅表示对此“欢迎”，以及将“允许”日本企业向该基金会“自愿捐款”。简言之，日本应付“罚款”变成自愿“善款”不说，还摆出了一副“给是人情不给是本分”的高姿态。

二、三大困境

尽管韩国政坛左右割裂明显，但至少在追究日本历史罪责问题上，即便素称“亲日亲美”的右翼主政期间也始终守着一一条不妥协底线。尹锡悦上台后却一退再退，不仅突破了第六共和国以来韩国右翼自己的底线，甚至突破了日方让步的底线，和此前方方面面的几乎所有想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尹锡悦面临“三座大山”的压力。

第一个困境就是美国。近年来美国一直鼓吹所谓“印太战略”，试图在不能投入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巩固和扩张其在“印太”，尤其是远东地区的霸权地位和战略优势。近年来，美国更是谋求从军事、地缘到经济、科技，都试图在远东筑起一道针对中国的“封锁弧”。这就要求日本、韩国这两个美国在远东最富强、最重要的“小伙伴”在美国指挥棒下更卖力地“随节奏起舞”，替美国分担解愁，而不能相互掣肘，彼此抵消，给“老大”添堵。

正因如此，美国官方才早早下场，调解日韩半导体原料争端。而当尹锡悦“知趣”地抛出前述“历史性建议”后，美国总统拜登也不惜“纡尊降贵”，亲自出面称赞该建议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间合作与伙伴关系开创性的新篇章”。

就在韩日“历史性”首脑会晤同时，美国牵头，美、日、韩、加拿大、印度 5 国参加的“海龙 23”联合反潜演习，正在一个被称作“日本 S 海域”的日本附近海域展开。这次联合反潜演习于 3 月 15 日即会晤前一日开始，以竞赛和培训等形式持续 270 多个小时。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和韩日“历史性改善关系”，是从不同侧面贯彻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尹锡悦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经济。韩国虽然躲过几次金融、经济危机，却在近期陷入出口乏力、经济滞涨的困局，一度欣欣向荣的半导体产业因处于产业链中日本“下游”，在韩日半导体争端中处于相对被动、不利局面。相较左翼，右翼所代表的财阀、大企业等，更不希望继续在贸易争端中受损。

其面临的第三个困境，则是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因种种原因，自尹锡悦上台以来半岛南北方关系再度趋于紧张，仅今年一年，朝鲜就进行了至少 4 次弹道导弹试验，最近一次正是在尹锡悦出访前完成的。客观上，这些导弹试验让美日找到了说服韩方相信“重大安全威胁近在肘腋，韩国必须倚傍美日确保自身安全”的口实，也让检察官出身、政治阅历并不丰富的尹锡悦相信，有必要为了所谓“安全”，牺牲一下“民族的脸面”。

三、五年政权的悲哀

所获甚多、志得意满的日本，用一餐韩日合璧的寿喜烧-蛋包饭工作晚餐接待尹锡悦，岸田文雄更表示，“从现在开始，我希望通过双方不拘泥于形式的频繁访问，开启日韩关系的新篇章”。

很显然，日本并不满足于“一次性消费”。但韩国民众对此却并不买账。本周稍早公布的最新盖洛普民调显示，反对尹锡悦“基金赔偿建议”的韩国受访者逾六成，认为现任日本政府对日本殖民统治历史罪责毫无悔意的韩国受访者更高达 85%。

与此同时，不仅部分韩国受害劳工直接表示对此“不服、不满”，韩国反对党更将尹锡悦的“基金赔偿建议”以及此次访日视作“国耻”“奴才外交”。

“冷战”结束后，韩国左右翼实力旗鼓相当，谁也无法长久把持朝政。当初为防止军政权卷土重来，韩国第六共和设立了独特的政体，一方面总统在任上权力巨大，其他势力难以掣肘；另一方面总统任期五年，任满不能连任。

在左右翼势力接近的状态下，这种权力结构不仅造成韩国卸任总统“例不得善终”的奇特现象，也让历届韩国政府的重大政策、尤其左右分歧明显的政策，往往以五年为期“翻烧饼”。南北政策、财阀对策如此，对日政策当然也不例外。

尹锡悦虽手握大权，当选时却仅获得了“误差范围内”的微弱优势，执政党和右翼在韩国国会中的优势也并不明显。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也好，日本也罢，其寄托厚望的“铁三角”建立在尹锡悦及其派系——更何况，尹锡悦原本是“政治素人”，和其派系的关系也并不密切——“情投意合”基础上。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个看似坚固、实则叵测的“五年期权”而已，尹锡悦能否对日本“慷慨到底”也很难说。

四、韩冒巨大内政风险推动合作出于利益考量

韩国希望借对日外交改善本国安全和经济处境。此前，韩经手美国、波兰向乌克兰提供炮弹等武器，受到普京的点名警告。因此，韩国有关发展对日关系改善本国处境的迫切需求。正如尹锡悦在访日前对媒体所言，“考虑到东北亚局势的严峻发展，韩日合作的必要性正在增加”。

在经济上，韩国 2023 年预期经济增长率仅为 1.2%，接近停滞。自 2022 年起，韩国对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甚至一度出现逆差。韩国将对日经贸合作视为提振本国经济的新动能。韩国总统室经济首席秘书崔相穆称，日本是全球供应链和“新经济安全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是韩国在芯片、电动汽车领域的重要战略伙伴，双方有必要早日取消贸易限制措施，恢复正常经贸关系。

此外，韩国也希望借对日关系改善为尹锡悦下个月的对美访问预热。韩日关系紧张是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合作体系运作的主要障碍。美国多次施压韩日修复关系。为了保证对美出访能有斩获，韩国也有必要修复对日关系。美国对韩国此次的表现也很满意。拜登、布林肯等高层第一时间力挺尹锡悦的“领导力”，为其加油打气。

虽然宣称韩日进入“正常化”状态，但从日韩峰会未发表联合声明和两国舆论反应来看，双方分歧仍然很大，后续韩日关系的改善恐难以一帆风顺。

日本坚持劳工问题在 1965 年日韩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不承认强征劳工的事实存在，更未为之道歉。岸田反而要求韩国履行 2015 年的《韩日慰安妇协议》，在该协议中，日本设立基金对“慰安妇”进行补偿，但拒绝承认慰安妇的事实存在。日本舆论普遍的“嫌韩”心态也会影响日韩关系的改善。日本共同社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年轻人认为日韩关系“将变好”的比例仅为 17.5%。

韩国政府在不获日本真诚谢罪的情况下单方面对日让步，国内民众一片哗然。韩国爆发了多个大学生、青年团体参与的集会抗议。有人甚至将尹锡悦、外长朴振、安保室长金圣翰等五人称为出卖国家的“癸卯五贼”。近日韩国民调显示，反对尹锡悦对日方案的民众高达 59%，尹的支持率比前周下降 4 个百分点。尹锡悦希望通过在对日问题上的“决断”集结保守势力支持，并靠接下来的对美出访和参加 G7 峰会来提振支持率，但从韩日过去的交往史看，韩日关系的进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简析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 虎

第 4 次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从智能手机到为互联网提供动力的数据中心，再到人工智能算法，都离不开半导体。急剧的数字化转型推动半导体需求激增，也促使其成为各国科技角力的焦点。美国去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欧盟 2023 年 1 月通过《欧盟芯片法》草案，增加本土补贴、强化出口管制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东亚作为半导体制造中心之一也在加码发力。近期，韩国政府宣布，将吸引 300 万亿韩元规模的民间投资，在首都圈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集群。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宣布，到 2030 年，国内半导体及相关部件材料制造商总销售额力争达到目前水平的 3 倍，约 15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7760 亿元）。韩日现在是美国主推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成员，在半导体发展的历史上，这三个国家有着一言难尽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历经曲折。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半导体制造业辉煌一时，因挤占美国市场被美打压后走入低谷，韩国企业借此获得翻盘机会。如今，日本又与美国在半导体领域携手同行。在半导体领域与美国合作，感觉到了命运的奇异。2022 年 5 月，日本时任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在访美时说出了心里话。

一、日本半导体所面临的困境

过去三十年被视为日本半导体“失去的三十年”，这个国家当下东山再起的意图呼之欲出，去年宣布将与美国共同投资 1.3 万亿日元用于联合开发下一代半导体，包括软银、索尼、丰田在内的日本 8 家大企业已共同注资成立 Rapidus 公司，目标打造尖端半导体。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也正在熊本县建设工厂。

过去日本在复兴半导体产业方面落后了，下一代半导体项目是弥补的最后机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3 月在参议院说道。时代变迁，日本半导体产业寻求重返巅峰的道路并不平坦。最大也是最后的机会。半导体技术正处于结构性转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日本经济产业省顾问、半导体战略室长荻野洋平 2 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最大也是最后的机会”，因为半导体产业不再单纯遵循“摩尔定律”（半导体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两年翻一番）。

日本政府近年来在半导体产业上的系统性布局始于 2021 年 3 月，经济产业省设立“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研究会”，指示“三步走”——恢复半导体产能、推动下一代半导体发展、为

未来技术“奠基”。第一步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引入台积电。日本政府提供总额约 4760 亿日元的补贴，邀请台积电在熊本县建设半导体工厂。

日本政府以巨额拨款补贴一家海外企业实属罕见。经产省解释，引入台积电有助于半导体的稳定采购、促进尖端半导体研发。索尼公司也注资加入，与台积电共同建设熊本新工厂，计划生产的芯片类型在日本国内属于尖端技术，对于台积电来说早在 10 年前就已经掌握。但是这可能成为日本九州地区构建纯电动汽车（EV）供应链的基础。过去，九州曾被称为日本“硅谷”，80 年代集聚了大量半导体产业，现在寄希望于台积电重振旗鼓。

熊本新工厂将于 2024 年 12 月投入运营，预计雇佣 1700 名员工，培养半导体从业人才是日本当前半导体布局的当务之急。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1998 年半导体制造商的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19 万，由于产业衰弱，2020 年这一数字下降 70% 至 8 万人。日本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组织“九州半导体人才开发联盟”预测，未来 10 年在半导体领域，九州地区每年大约会有 1000 人的人才缺口。

在少子老龄化加剧的日本，劳动人口的数量和占比持续下降，高科技人才更加稀缺。日媒指出，由于半导体行业爆发式增长，全球范围内人才需求量在欧美，以高薪吸引高技能人才资源的趋势明显，而日本公司面临的难题是，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高薪聘用人才的成本大幅提高，或将在人才争夺中落后。

迈出第一步后，剑指下一代半导体的第二步紧随其后，日本经济产业省去年 11 月牵头组建了“技术研究组合最尖端半导体技术中心（LSTC）”，随后，丰田汽车、索尼、NTT、NEC、软银等八家大型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Rapidus，计划最早 2025 年在日量产 2 纳米芯片，希望复刻当年“日之丸半导体”的神话。

上世纪 90 年代末，当时由日本通商产业省主导，NEC 公司和日立制作所分别剥离旗下业务，统合成立了日本国内唯一的 DRAM 制造商——尔必达公司，一度在全球 DRAM 领域掌握近两成份额，因有政府资金和政策的保驾护航，被打上了“日本制造”的烙印，也被称为“日之丸半导体”。经历早期大幅扩张后，尔必达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之后又遭遇 2008 年金融危机，日本政府极力扶持，仍回天无力，走向破产。

时隔 20 年，日本政府再度大手笔拨款打造国内半导体产业，岸田文雄曾在施政演说中谈到半导体政策：“在这一领域，我们将聚集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10 年内需要增加 10 万亿日元。”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称，目前各国政府的巨额支援影响产业的沉浮，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迎来了政治掌握命运的局面。

目前，日本政府的主要支援去向之一是助推 Rapidus 在北海道建成投产。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在为 Rapidus 补贴 700 亿日元后，4 月 10 日敲定计划追加 3000 亿日元。Rapidus 董事长东哲郎表示，该公司将需要 7 万亿日元的资金，以便在 2027 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先进逻辑芯片。有分析指出，如此庞大数目的资金如何筹措被视为一个问题，而且 8 家企业形成统一经营思路

也并非易事，很难形成一两家公司主导的局面，因为除三菱 UFJ 银行之外，其他 7 家的投资数额相当。

起步较晚的 Rapidus 以量产 2 纳米芯片为目标，2 纳米指的是半导体的线宽，线宽越小性能越强大，而现在掌握“3 纳米”芯片量产技术的公司都屈指可数。作为该领域的头部企业，英特尔、三星、台积电正朝着“2 纳米”冲刺。因此对于 Rapidus 的野心，不少人提出了质疑声。

二、寻求外界帮助

由于日本半导体产业相对缺乏大规模生产尖端产品所必需的技术，对外合作至关重要。东哲郎说，过去美国阻碍了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现在有美国的支持是振兴良机。日美均拥有经济和安全保障不可分割这一信念。在 2022 年 7 月举行的日美“经济版 2+2”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两国主导构建“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强化供应链和保护尖端技术等 4 项行动计划，并将建立一个先进半导体联合研发中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指出，当下日美之间的合作是技术交换型合作，并不是所谓的“美国主导、日本依存”，而是将各自优势进行重组融合，最后形成一种垄断性的技术优势。

日美政府间达成合作计划后，Rapidus 与美国 IBM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宣布建立伙伴关系。IBM 从 2015 年退出半导体生产，目前没有自己的制造工厂，但研究和开发并未中断，并于去年 5 月宣布在实验室中成功制造 2 纳米制程的芯片。IBM 需要扩大生产外包，Rapidus 则需要快速获得先进工艺技术，两者一拍即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实现下一代半导体的量产，极紫外线光刻机（EUV 光刻机）的引进必不可少，而目前全球只有荷兰公司 ASML 能够生产 EUV 光刻机。

光刻机原本是日企擅长的领域，上世纪 80 年代，在光刻机领域形成了垄断地位，尤其是尼康曾一度独占行业 50% 以上的份额，随后佳能也入局光刻机。根据美国 IT 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 Gartner 的报告，90 年代中期，尼康和佳能占据全球 70% 至 75% 的市场份额。诞生于 1984 年的荷兰公司 ASML 后来居上，从世界各地的供应商精心采购部件组装光刻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指出，受益于三星、台积电、英特尔的投资和外部技术合作，还与数百家供应商建立了独家采购关系，ASML 得以在 EUV 光刻机领域高歌猛进。

相比之下，像尼康这样的日企更倾向于研发和器部件的自给自足，开发成本高、速度相对较慢，这被视为日企涉足 EUV 光刻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也与日本政府的战略有关。日本前经产相萩生田光一去年在众议院会议上表示，日本半导体产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拥有全球最高销售额，但竞争力在接下来 30 年里持续下滑，是因为当时政府无法洞察全球产业趋势，没有实施适当的政策。

EUV 光刻机的需求亟待解决，岸田政府的目光望向海外。去年末，Rapidus 与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签署了技术合作备忘录，今年 3 月两家公司同意合作开发尖端光刻机技术，包括 EUV 光刻机。IMEC 作为半导体制造独立研究机构，与 ASML 密切合作约 30 年，共同升级 EUV 光刻机和开发下一代 High-NA（高数值孔径）EUV 光刻机。对日本来说，寄希望于 IMEC 为其注入核心技术力量。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 80 年代主导半导体产业发展，是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没有外部技术援助，但是日本现在意识到仅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强调外部技术支撑。陈友骏说，从总的战略方向来说，日本会主攻半导体产业，因为在 5G 技术上输给了中国，将寻求在 6G 战略上超越中国，这离不开半导体的发展。

陈友骏还指出，过去国际市场主要是欧美，而现在相对原来的区域化市场而言，实际上是全球化市场，尤其像中国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支撑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市场资源。然而，日本却选择在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紧跟美国出台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措施，与一部分市场相隔绝。

三、管制制度的柔性

2023 年 1 月 13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拜登（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会谈。去年 10 月，美国拜登政府出台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在美国敦促联动的情况下，岸田政府对此一直含糊其辞。今年 1 月，岸田文雄与拜登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路透社称，美国希望说服日本加入到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的行列中，这也是首脑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会后，岸田文雄说，日本将“负责任地”考虑如何处理半导体贸易。

时隔 3 个多月，日本于 3 月 31 日宣布将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法》，拟对 23 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正在就有关措施征求公众意见。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与去年 10 月美国出台的措施并不一致，没有针对特定国家。”总体而言，对日企的影响有限。”

管制涉及的对象是在半导体制造中“前工序”（负责形成电路等的制造工序）所需的品类。事实是，受到管制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除面向友好国家等 42 个国家和地区之外，出口其他国家需要申请许可，中国也在需要许可之列，而中国是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4 月 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日前日方宣布将加强对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在人为对中日正常半导体产业合作设限。中方已就此在不同层级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陈子雷指出，预计管制政策的限制程度和范围存在弹性，回旋的余

地较大，这张牌怎么打，受到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日本政府要确保管制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上。原本日本寻求在半导体产业取代美国，而现在美日利益一致，日本整体上会跟随美国对华半导体进行打压和封堵，而这种非理性的决策已经不太顾及对经济、贸易、产业、就业、经济福利等影响。

根据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的数据，2021 财年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海外销售额约为 3.443 万亿日元，其中三分之一是流向了美国，位居各出口国之首。《日本经济新闻》称，如果对华出口管制落实，目前半导体制造设备对华销售的一半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于东京电子来说，中国厂商是其最大的客户之一，管制的影响不容忽视。当被问及此事，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商的东京电子对澎湃新闻说，“以公司的立场，不对国家之间的政策决定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商未回复。

尽管日本经产省就管制措施征求意见，鲜见日本半导体设备厂商公开发表意见。陈子雷认为，日本经济界预计不会像过去那样高调公开反对，必须优先服从美国“反华遏华”战略。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在过去几十年各国政府放权让利，以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投资贸易，带动产业链，而现在权限已逐步回收回到美日政府手中，这将对各相关国家的经济活力带来很大冲击。

在半导体领域，国际角力不可避免，各方都想摆脱对彼此的依赖，但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完全自主也非一朝一夕，如何与全球其他国家合作仍是重要的课题。

韩国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程璐璐

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化市场的推动也是一大助力。政府与企业定位清晰，一方面政府在制度保障、机构设置、财政支持和人才培养方面提供便利和保障，另一方面在市场的推动下，企业的广泛参与让文化产业更加富有活力。

一个国家战略的成功实施离不开政府部口的导向和大众的参与。韩国“文化立国”战略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正确的实施途径分不开，法律法规的建立使得战略实施有了根本保障，资金的支持使得战略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人才的培养为战略长久发展有了坚持的基础。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功地寻找到了韩国文化的定位，它是儒家文化与美国工业化的大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与调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一、法律法规及制度保障

1997年的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发展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不光是文化产业，制造业、农业、手工业都深受其害，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韩国上下也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在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韩国只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这种更具全民参与色彩的，更能凝聚民族向心力的经济突破口，很快受到政府的重视，不久，关于文化产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压力，也为韩国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98年，金大中总统上任后提出了改变韩国命运的“文化立国”发展战略，确定了文化产业作为韩国发展的支柱产业的地位。《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及《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为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了中长期目标，随后《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规划》等也相继面世。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在积极地修改当时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确保能够与时俱进，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至此，韩国文化产业得以在健康道路上快速发展。在文化产业下面的各个行业，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电影振兴法》、《广播法》等，为电影电视业、出版业等行业提供了具体而且明晰的发展道路，为各行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创立一个良好的有利环境，通过为文化产业提供有利的资金支持，构建全国文化产业网络，并让一些重点文化产业起到带头作用，加强对海外市场的开拓。

2001年，韩国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这一机构的设立为“文化立国”战略的推行提供了更好的保障。然而好景不长，美国次贷危机再次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为了早日实现国民人均收入突破四万美元的愿望，韩国政府再次调整政策，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些更具针对性，更加有效的法律法规，因为之前成功的经验，使韩国意识到文化产业这一具有高附加值的支柱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再次确立其重要地位合情合理。次贷危机后不久，韩国颁布了《韩国文化产业内容振兴政策》，国家政策的形式确立了各部门的职能，细化了各部口的职责范围。2009年和2010年，韩国政府两度修改本国《著作权法》，前者加强了对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认定和惩罚，后者则明晰了不同情况著作侵权的不同惩罚以及损害赔偿额度，即一般著作权遭受侵犯，被侵权人可申请最高1000万韩元的法定赔偿。著作权法的限定与明确，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营造了有序健康的产业竞争环境。

二、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文化立国”战略的提出，相应部门也宣告成立，以确保法律法规的执行。同时，有了相关责任单位，也使得文化产业更有效率地发展。韩国于2008年正式成立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致力于制定与实施文化、艺术、体育、观光、宗教等各种领域的相关政策，为韩国民众提供参加文化活动体验的机会。其主要目标有，教育国民如何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公民；致为于建设一个休闲生活和工作生活相和谐的社会；通过文体活动的举办，丰富国民的生活，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文化体育观光部的前身是文化观光部，而文化观光部的前身是由文化部和体育青少年部于1993年合并而成的文化体育部，类似这样的机构整合还有很多，比如由游戏技术开发中心、游戏技术开发支援中心、游戏综合支援中心合并而成的韩国游戏产业开发院，后来由于工作重心的不同，更名为韩国游戏产业振兴院。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各管理机构不断完善，工作内容更有针对性，对韩国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规划、监督作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制定了《首届大韩民国公共外交基本计划（2017-2021）》、《国际文化交流振兴实施计划（2021）》，并把2020年定为“新韩流（K-CULTURE）元年”，同时在文化体育观光部专门设立了“韩流支援协力科”积极推进后疫情时代“新韩流”政策，旨在扩大同新南方、新北方、中日韩及发展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同时利用数字化技术及网络平台，加强“新韩流”的传播。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是另一个主管文化发展的政府机构，成立于2001年，相对于文化体育观光部，振兴院负责的事务更加具体，包括开发、建立文化产业的创作基地、文化商品的对外营销、保护地区传统文化等内容。此外，振兴院还积极开展对外业务，于2001年底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通过中国媒体的宣传，扩大了韩国文化在亚洲范围内的影响。韩国著作权委员会先

后于 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在中国北京以及泰国曼谷设立海外著作权中心，通过海外著作权中心预防韩国电视剧著作权在海外遭受侵犯，并及时给予权利资讯以及法律顾问支援等帮助。借助国内与海外针对韩国电视剧产业的法律保护，保障电视剧企业有序竞争的同时，为产业海外市场的拓展给予有力支持。

在“韩流”文化走向全球的过程中，驻外韩国文化院也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作为韩国政府介绍韩国文化的重要场所，驻外韩国文化院通过运营与驻在国相符的项目，宣传本国文化，推动韩国与驻在国在文化、艺术、旅游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改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截至 2023 年，韩国已在全球开设 33 座韩国文化院。分析驻华韩国文化院近年来的重大活动可以发现，驻华韩国文化院主要是依托“韩流”这一民族文化品牌，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与韩国政府对外宣传国家形象的大局密切相关。驻华韩国文化院常年开设韩语、跆拳道、声乐、料理、舞蹈等韩国文化课程。韩语教学由世宗学堂的讲师授课，由于其专业性、公益性和权威性的特点，驻华韩国文化院的韩语学堂一直备受关注，课程预约始终处于爆满状态。此外，驻华韩国文化院还经常开展韩国电影赏析、文艺演出等活动。在各类活动中处处可见“韩流”文化贯穿其中，2021 年 5 月、6 月就分别以“奥斯卡得主尹汝贞作品展”、“青少年保护”为主题，在文化院免费放映韩国优秀电影作品。作为韩国民族代表性品牌在海外的推广与传播，有效提高了韩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三、财政资金支持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方面的支持，文化产业也不例外，特别是在起步阶段，更加需要大量资本的注入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重视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的产业模式，其不仅具有盈利方面的性质，更加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的属性，所以在一开始，政府有必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投资。许多文化产业都是由中小型企业逐渐壮大而来。这些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很难幸存，这就需要政府对这些中小企业进行投资并建立扶持政策。

文化产业资金回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经济效益远不如投资其他行业明显，这就导致单凭市场难以满足需要，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投入可以说是下大力气，不计成本。2000 年，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投入第一次达到国家总预算的 1%；次年，持续上调 9.1%，进入“一兆韩元时代”。韩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专项基金，也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市场，具体项目有文化振兴基金、影视振兴基金、信息专项基金等。韩国政府通过各个渠道进行融资，带动文化产业积极发展。除了对各行业的投资外，

韩国政府还积极致力于文化基础设施投资，2002年，为实现文化产业能朝着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韩国政府文化产业群提供了高达5000亿韩元的资金。

随着预算的逐年递增，文化相关行业形势一片大好。除了在资金方面的直接支持，韩国政府还为进入文化产业公司提供多种便利渠道和优惠政策。韩国政府为提出文化产业创业的公司提供低息贷款，为其减免税务负担，不仅如此，韩国政府还为在文化产业园投资的企业减免各种转让费，有的还给予交通补偿费。除了政府方面的投资，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韩国有多种基金用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文化产业振兴基金、电影振兴基金等。韩国文化产业的基金主要来源与社会上的资金，除此之外，政府和民间也对文化产业进行融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1年至2002年，共融资2073亿韩元，其中包括政府资金为350亿韩元，民间资本1723亿韩元。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文化产业金融融资为韩国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及建设和出口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四、重视高等教育及专业人才的培养

韩国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研发人员总数、教育公共支出预算等方面较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政府每年对教育的投资占政府总预算的五分之一，可以看出韩国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十分重视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而人才是创新意识的主体。文化产业相比于其他产业的发展更加注重创新意识，创新是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所在。韩国通过高水平的教育向社会输送更多的人才，而韩国文化产业也更加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其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韩国成立“产、学、研”联手的人才培养委员会。此外设立了“教育机构认证委员会”对文化产业教育机构进行认证，同时韩国还委托院校和企业开展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资格培训。培养创新型国际文化人才的高校在不仅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而且能有机调动人才培养与文化市场企业的有机对接。泰晤士高等教育网站2022年4月发布的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显示，韩国有3所大学进入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排行榜的前15名。

韩国不仅专注于国内的培养，同时也注重文化产业人才的海外培养。在政府对文化人才管理与培养系统的调控、完善下，韩国以培养文化复合型人才为教育战略，设立“文化产业人才库”等专门文化培养机构以追踪文化产业发展动向，推动学校培养游戏、漫画、影视等文化技能人才并与国内企业对接合作文化项目，让文化人才第一时间明确国际的文化价值取向、掌握国际市场所需的文化技术，同时还会委派韩国国内优秀的人才去文化产业比较成熟的国家进行学习进修等。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才培养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比如形成了网络与其他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方式。韩国通过多种方式培养文化产业的专业人才，开拓提升了韩国文化

产业的人才的视野与专业素养，更加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这使得韩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对具有一定的优势。

例如，为了将釜山建设成“电竞城市”，韩国举办了世界电子竞技峰会，建立了电子竞技学院，研发 VR 电竞等以创造未来发展的电竞产业环境和培养大量选手，不仅能够扩大韩国的影响力，同样还能够营造一个健康的游戏文化。其次，韩国的国际电子体育联盟还与国际大学体育联盟（FISU）签订了协议。国际电子体育联盟为 FISU 的大学生体育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制定电竞领域的规章制度并共享组织内部的资源与经验。此外，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传统体育与电竞之间的协同作用，今后两大机构还将联合举办一定的赛事。

韩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与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了发展文化产业，韩国政府通过制定“文化立国”战略、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制定政策和法规、建立资金支持体系、扩大海外市场等渠道，最终成功推出电影、电视剧、音乐、电子竞技和漫画等几大支柱性产业，而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有力推广了韩国文化，还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以及社会民众的参与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全社会的强大合力最终形成了一套韩国独特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不断推进韩国文化产业往新的高度发展。

东亚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东亚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

2023年5月19-23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东亚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暨亚洲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史林》《探索与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学术期刊、出版社的八十余名学者与会。会议的主题发言从古代到近现代，横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围绕东亚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展开了热烈讨论。



开幕式上，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以《作为“世界”的亚洲》为题做了致辞。他强调东亚文明的重要性，在思想、宗教等各个领域亚洲拥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亚洲的多元化是目前趋势，上海师范大学成立的亚洲文明研究中心将聚焦新的内容、新的方法、新的史料，创造出有关亚洲文明的全新研究成果。

接下来的主题发言环节由中心副主任刘峰、康昊主持，发言学者围绕“东亚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的会议主题，探讨内容新颖，强调新材料与新方法，在区域史、全球史视角下探讨了东亚文明的世界史意义。

主题发言结束后，5月20日下午和5月21日上午会议分三个分会场、九个分论坛进行分论坛发言，五十多位学者分享了近期的研究。从国别上看，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菲律宾是

主要研究对象；从内容上看，既涵盖经济、政治、又重视文化、思想和宗教；从层次上看，微观视角与宏观视野并重，关注国家间的关系。

《史林》评价道，本次会议系统介绍了东亚各国的相关研究，本会学术综述、研究梳理、理论探索、实证研究充分结合，研究主题新颖，考察内容不止经济政治，也重视思想文化层面；采用全新的视角，如新东亚史、新儒学中国化等；讨论了诸多启发性的主题，如前哨文明、汉字、社会史等。会议的举办和亚洲文明研究中心的建立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东亚文明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东亚管理学国际高峰论坛 在韩国成功举行

2023年6月16日至17日，由韩国管理学会主办的“东亚管理学国际高峰论坛”在韩国首尔及江原道春川举办。会议主题为“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全球疫情，使得全球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世界各国都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本国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会确立了“重构新时代数字经济理论与摸索管理学未来变革”的相关议题，共同探讨在数字经济大潮下，政府管理、城市管理、企业管理等如何变革和创新。

大会针对上述“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的主题集中探讨，可以更有效地为国家、企业、政府提供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困局的正确思路和决策方向，也将为各行业企业解决危机、困境中挖掘优势，实现健康良性发展提供助力。韩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轮值理事长朴善林教授表示，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围绕“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展开一系列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当前差距，是当前我国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东亚管理学研究蓬勃开展，上世纪90年代，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成立了管理学研究会，共同组织开展实学思想与现代发展研究。30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会积极联合、组织东亚国家实学界共同开展实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中、韩、日三国实学界团结合作的学术交流氛围。由中、韩、日三国实学会轮流召开，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品牌。

本次大会汇聚了东亚管理学界顶级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共同探寻数字经济下的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与对策。东亚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秘书长金丽华教授表示，管理科学是一个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未来

东亚管理学基金会、韩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和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专家和广大管理实践者一起共同促进国管理学人才的成长，提升东亚管理学理论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信息来源：DAUM 新闻）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

